

# 從革命到日常

## 文革口號「造反有理」 成為日語四字熟語的過程探析

曹嗣衡  
香港中文大學

### 摘要

「造反有理」是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的革命口號，後來亦成為日本的四字熟語。本文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以降日本的主流新聞報章、專欄、雜誌文章、學生組織及左翼團體刊物、流行小說等文獻為基礎，探討毛澤東提出的革命口號「造反有理」、「造反」等用語在日本的在地化過程及使用情況，解釋「造反有理」如何從一句激烈的革命口號，先被日本人視為外來語接受，繼而逐漸成為一個常被用於與政治關係不大的語境裏使用的四字熟語，融入日語系統。本文亦嘗試為「造反有理」一詞能夠被日本人接受、紮根於日語系統內，提出思想史及語言學上的理由。原來的革命口號，融入了日本語系統之中，這現象反映了日本人接受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側面，亦顯示了一種政治思想如何在日本留下其非政治遺產。

關鍵詞：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日本、四字熟語、流行語

---

February 4, 2023 收到稿件 / May 26, 2023 接受刊登

《中山人文學報》no. 57 (July 2024): 71-99

§ 曹嗣衡，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博士候選人。

Email: 1155121998@link.cuhk.edu.hk

## 前言、從《廣辭苑》「造反」、「造反有理」項說起

一九六六年，以毛澤東(1893-1976)為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文化大革命，同時積極對外輸出革命，以「造反有理」精神為象徵，毛澤東思想在全球傳播，於世界各地成為各種左翼運動的原動力之一，日本亦不例外。岩波書店辭典《廣辭苑》釋「造反有理」為：「違抗體制或權力是有道理」。並說明此為「毛澤東的用語」(「ぞうはん-ゆうり」)。這釋義並沒有特別，但《廣辭苑》釋「造反」時附上的說明語則相當耐人尋味。《廣辭苑》解釋「造反」為「反對體制、權威」，亦即日文的「反逆」，並附上說明：

在中國，是謀反之意。文化大革命以降，在日本亦成為一般化的用語。(「ぞう-はん」)

《廣辭苑》簡短的說明語，顯示了作為漢字詞語「造反(有理)」在日本經歷了進入與適應、接受與轉化等過程，最終成為日本「一般化的用語」。

翻譯是海外傳播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會遇上阻力。劉禾《跨語際實踐》考察了一種語言(一般被稱為「本源語」，而劉氏稱為「客方語言」)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目標語」，而劉氏稱為「主方語言」)時，新的詞彙如何獲得合法性，脫穎而出成為一種被選用的新語(劉禾)。因此，語言在翻譯時經過譯者考慮、讀者選擇，以及傳播媒介的過濾，甚至出現競爭，而能夠經過這種翻譯過程的，必然是兩種不同語言，如劉氏的研究則在如英語等西方語言與中國語的關係。雖然日語與漢語屬兩種不同系統，但劉氏的理論無法解釋日本接受中國「造反(有理)」的情況。劉氏認為，新詞、新話語進入另一種語言時，當中「翻譯」過程就成為政治、意識形態衝突與角力的場所，兩種語言將要競爭，直到新詞在另一語言中固定下來(劉禾26)。但是，劉氏試圖指中主方語言的「抵抗」與主體性，雖然其結果有可能是「屈服」與「妥協」，承受客方語言的權力牽制，但我們似乎還應考慮到另一種更直接的翻譯處境，即主方語言毫無條件、毫不抵抗的「投降」——而本文處理「造反有理」進入日本的情況，正是這一處境。日本歷史上有「下剋上」一詞，其歷史傳統成就其意涵(黑田基樹)，意指在下者(意圖)取代或推翻在上者，意義與「造反有理」相近。但「下剋上」完全沒有與「造反有理」競爭，兩者亦沒有進行對話，於其說是「造反有理」的勢頭太強，倒不

如歸因於漢字同樣是日語的一部分，漢語「造反有理」被「翻譯」成日語時，還是「造反有理」，它很快可以適應日語系統，毋須與其他詞彙「競爭」。Julia Lovell (2006)於《毛澤東主義》便舉「紙老虎」為例，指出因東非沒有老虎，所以在翻譯此語時要譯為「紙豹」(paper leopards)。但日文毋須面對這語言隔閡問題。日本有四字熟語的傳統，相當於中文四字成語(牛雨薇 3)，「造反有理」四字本身都是日語中的常用漢字，所以「造反有理」有語言上傳播到日本的先天優勢，使它不論在漢字字形抑或意義上可以原封不動地傳入日本。可以說，日本人有接受「造反有理」的語言條件。

學界目前關於毛澤東思想對日本的影響，大部分都集中在政治紛爭、知識界之辯論、社會運動等(馬場公彥；小熊英二 2009, 2009a)。學者一般並不把「造反有理」作語言分析，也不視之為獨立課題並加以討論，而視為一種精神或象徵，其討論離不開其與政治運動本身的關係。福岡愛子《日本人的文革認識》討論了日本學生、學者、傳媒等人如何了解文革，當中提及「造反有理」時，通常視之為一種概念，而討論亦集中在「運動」或「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中(福岡愛子 2014)。儘管漢學家興膳宏在二十一世紀之初亦留意到儘管文革遠去約四十年，「造反」一詞在日本保留下來(興膳宏 36)，但興膳不過是在新聞提出其觀察，並沒有加以探究箇中緣由。程映虹《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探討了毛澤東思想在世界各地如古巴、秘魯、新加坡的影響力，而完全沒有提及日本，福岡愛子在書的日語譯版中認為，日本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革命分子或大學生的運動「於組織上弱小，不至於具有影響力，〔因此〕此書不提及日本的情況也有道理」(福岡愛子 2021: 491)。但是，毛澤東思想對日本的影響其實不止在政治鬥爭、社會運動上，亦可帶來其他社會影響。例如，當時日本有些企業家意圖從《毛澤東語錄》學習企業管理方法，於商業上利用毛澤東思想(曹嗣衡)。而本文則認為，毛澤東思想的另一個對日本的影響為，它在日本語增添了「造反」與「造反有理」兩詞。從兩詞能在文革後仍存活在日語中並間中被加以使用的情況來看，毛澤東思想對日本的影響並不淺，只是它也帶來的影響不一定在政治上，也可以在語言上。事實上，「造反(有理)」在日本的使用情況與中國的不無分別，而一種外來思想、文化從某地傳播到外地後其涵義產生變化，受接受一方有意無意的選擇、取捨及改造可謂相當自然，只不過「造反(有理)」在

日本的「外觀」原封不動，隱藏了這一點。毫無疑問，「造反有理」對日本人來說是個新詞，日本人對其義相當陌生。可是，在它被「翻譯」時，它在字形、排序上又沒有被「翻譯」，這方便了「造反有理」一詞進入日本。

不過，《廣辭苑》是辭典，沒有責任解釋「造反」是如何變成日本語，但它留下許多很多值得深究的問題：一、為甚麼屬於「毛澤東的語言」的「造反（有理）」，會變成日本的用語？二、它如何、何時出現在日本人的視野內，日本人如何接受、理解、使用它？三、它怎樣在「文化大革命以降」，亦即文革與日本的新左翼運動完全衰落以後，成為一般的日語詞彙？為了解答以上問題，本研究嘗試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以降，日本的新聞報章、專欄、雜誌文章、學生組織與左翼團體刊物、流行小說等文獻為基礎，考察「造反有理」一詞的使用情況及演變，以還原《廣辭苑》將「造反（有理）」視為一般用語背後的過程與脈絡。

本文為首個探討「造反（有理）」如何融入日本語的研究，以跨歷史學、語言學的角度，分析毛澤東思想對日本的影響。本文將首先指出，「造反有理」隨文革進入日本，因其作為外來詞，語義陌生，產生出不同解釋，但仍基本作為一種對政治運動的整體理解；接著，它從專指政治運動上激烈的「造反（有理）」，逐漸弱化為廣義的「反抗」義，被活用在不同語境，除了政治事件外，也在一般時事、影評，甚至在圍棋雜誌、育兒專欄都有它的足跡；在中日兩國的政治運動風波止息後，「造反（有理）」成為一種時代記憶，終紮根在日語系統內。在本文的最後部分，亦嘗試從思想史及語言學的角度，略探「造反有理」在日本被接受的原因。

## 壹、作為政治運動的理解：革命用語「造反有理」進入日本

「造反有理」是文革中一句極為流行的革命口號，出自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裏面提及要學習史達林(1878-1953)，他說道：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

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毛澤東 para. 6)

在文革，「造反有理」是個不折不扣的激烈口號。<sup>[1]</sup>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造反有理」首次以標題形式出現在《人民日報》，裏面記載一名紅衛兵如何理解這句口號。不論在內容、精神，或者在語氣、情緒上，他都能很好地定義「造反有理」：

毛主席說「造反有理」，我們堅決照辦！一切不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只要它存在，我們就要造它的反！就要批判它、鬥爭它，把它打翻在地，並且踏上一隻腳。可是一些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卻不准我們造反，利用種種舊勢力，舊秩序，壓制、限制、陷害我們。我們知道，幹革命，造反動派的反是階級鬥爭，敵人必然反對我們。毛主席說過「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敵人越反對，我們就越要造反。我們要喊造反，唱造反歌，演造反戲，到處煽社會主義之風，點革命之火，讓全世界都燒起造反的烈火，把舊世界徹底打翻，砸它個稀巴爛！（〈造反有理〉2）

這段描述獲得官方認證，說明「造反有理」是暴力地反對舊體制、舊秩序、舊世界，以建立新的權威。「造反」與「批判」、「鬥爭」義近，用更通俗的語言說明即「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在文革中，則是要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的一切權威，後來甚至包括共產黨自己的權威，是一個具相當強烈意識形態的政治用語。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後，世界各地爆發左翼革命，隨著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作為激烈的革命口號，同樣傳到左翼思潮勃發的日本，成為日本的四字熟語。「造反有理」在日本的意思與使用語境與中國的有相同之處：在反權威、反體制這一點意義，以及同樣在階級鬥爭中作為一種思想、口號被使用。文革爆發初期，「造反有理」已經進入日本的公眾視野，此時期日本人對「造反有理」的理解有兩特點：一、由於其義還沒有被大眾完全理解，產生的翻譯、解釋甚多；二、因其來自革命運動，日本一般先將「造反有理」視為對政治運動的理解。

## 一、「造反有理」在日本多元的翻譯與解釋

當「造反有理」來到日本時，他還是一個陌生的「舶來品」，其意思尚未完全被公眾與媒體理解，報章引用時常要加以解釋。日本國內的報章於一九六七年始，就有以「造反有理」為題的新聞。《讀賣新聞》首次出現「造反有理」一詞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記者高木健夫的專欄「這就是中國」（これが中国だ）介紹毛澤東的少年時代。他解釋「造反有理」為「叛逆（謀反）也有正當理由」（むほんにも正しい理由がある）（高木健夫 1）。高木曾於戰前在中國辦《東亞新報》，精通中文，熟悉中國事務。他獲《讀賣新聞》派至中國採訪，於一九六六年末回國，翌年一月一日展開這連載專欄，輔以第一身經驗，報道文革中國的事情。可以說，高木不僅密集且迅速地將新近的中國資訊帶回日本，當中包含了「造反有理」這四字詞。

《讀賣新聞》第二次出現「造反有理」則是在社評上，介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中的政治鬥爭淵源時，註「造反有理」為「破壞是正確」（うちこわしは正しい）（よみうり寸評 1967）。記者的解釋與代表報章立場的解釋並不一致，後者的將「造反」解作「破壞」，顯然是有意無意地錯誤解讀，暗含對文革的批評與冷眼旁觀。後來，其社論又以「造反有理」解釋並概括毛澤東經歷了湖南農民運動、井崗山到延安時代的經歷、思想的根基，即有「抑壓的地方就會引起造反」，並將「造反」解作「謀反」（〈毛沢東路線と劉少奇〉）。

《朝日新聞》首次出現「造反有理」一詞則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比《讀賣新聞》晚了剛好三個月。在介紹中國政局重要人物的專欄「天安門上的人們」（天安門上の人々）上，以〈毛主席的理論秘書：造反有理陳伯達〉為副題，介紹毛澤東秘書陳伯達，但並沒有解釋何謂「造反有理」（〈毛主席の理論秘書〉）。第二次出現則是左翼學者菊地昌典的專欄「探索當地文化大革命的底蘊」內，以副標題形式展示了〈造反有理〉四字。在專欄內，菊地闡述了對中國「造反派」的崛起，認為「造反有理」已經成功植入造反者中心，並提出自己對「造反有理」的看法：「我只在『造反有理』的永續性與它強韌地反權力的指向中尋求它的意義」（菊地昌典 3）。《朝日新聞》最早期出現「造反有理」兩個例子並沒解釋何謂「造反有理」，但卻在標題或副標題上使用此四字詞，沒有加以直譯或下定義。

報章等大眾媒體有廣泛的讀者，報道國際時事一般簡易務實，偶有深入報道。《讀賣新聞》對「造反有理」的解釋相當直接易明，即在詞語後面加上括號，再加以直譯；《朝日新聞》不作解釋，只讓讀者憑內容理解。

學者及學生組織對「造反有理」有富於哲學性的釋義，憑理論、哲學來理解它，嘗試脫離字面意義，深入其內在理路。日中友好協會（正統）早稻田大學支部機關誌《紅河》將「造反有理」翻譯為「叛逆之內有邏各斯[Logos]」，並可作「叛逆內有固定的邏各斯」解（新島淳良 et al. 62）。《紅河》的解釋富於哲學性。邏各斯是希臘哲學用語，*The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解釋它「有兩個基本且相互關聯的部分：一、說話的結果，即演講、話語、理論（相對於實踐）、句子、故事；二、挑選或計算的結果，即帳戶、公式、原理、定義、比例、原因（既作為『一個原因』，亦作為『原因的力量』）」（“Logos”）。日中友好協會（正統）早稻田大學支部的高野威（後更名為津村喬）認為毛澤東的造反精神起以五四運動為起點，而「五四與文革共通的，亦即貫穿毛澤東思想的原理的，是一種『否定的否定』，是從造反到理，從叛逆到邏各斯，從思想上的自我確認到現實的變革，從革命型知識分子到生活的大眾」（新島淳良 et al. 62）。亦即將「造反有理」置於中國現代思想發展的潮流之中，從「五四」到文革，亦是從少數領頭的知識分子到目前的大眾運動。親中學者，被稱為「文革禮讚派」的新島淳良則視「造反有理」為一種無產階級倫理、道德來作考慮（新島淳良 et al. 63-64）。比起《人民日報》中引衛兵「把舊世界徹底打翻，砸它個稀巴爛」的暴力實踐，日本的左翼運動家、學者同時關注「造反有理」的內在思想邏輯與理路，使他們的釋義更具知性與哲味。

## 二、「造反有理」在政治運動脈絡下的理解

「造反有理」起初進入日本時並未完全被日本人理解，其意思未立即成自明之理，但它很快被與「造反」精神共鳴的左翼活動分子用作政治鬥爭口號。接著，口號開始有了影像效果：印有「造反有理」口號的旗幟，或成為牆壁上的塗鴉。「造反有理」常被鏡頭捕捉，成為鬥爭象徵，在當時相關的照片與映像紀錄就能輕易看到相關標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日本全國的大學捲入全共鬥運動（全共鬥）。在東京大學，學生組織「學生解放戰線」將「造反有理」、「帝大解體」的橫額掛在校門外，亦擺放毛澤東的肖像畫（〈学

生は発言する：11月決戦の戦術と戦略〉28)。東大本郷校區內，也有「造反」等塗鴉（渡辺眸 105, 154-155；立花隆 126-132）；京都大學校園內同樣四處都是「造反有理」等標語（譚汝謙 para. 4）。當「造反有理」不斷被鏡頭捕捉，《讀賣新聞》專欄「時事語言」再不厭其煩地解釋何謂「造反有理」，提到它被大學鬥爭中的廣泛使用：

造反在中國語是「むほん」〔按：漢字為「謀反」〕的意思。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造反有理」（理由ある反抗）這語句，在東大門爭中也被掛在東大的正門上，這語句亦被用在大學紛爭之上。（時のことば）

報道又提到在有高中教師、大學教授支持全共鬥，這些教師被形容為「造反教師」，亦被稱為「造反教官」（時のことば）。於此，「造反」一詞配合了日本有教師同樣「造反」的獨有風貌，衍生了「造反教師」、「造反教官」兩詞，使「造反有理」與「造反」漸呈本地化的樣貌。例如東京大學醫學部講師高橋晁正於東大門爭中即使醫學部復課時仍拒絕授課，被評為『『造反教官』一號』（〈コンピューターがなんだ〉）。當時，「造反教官」問題最明顯的是東京外國語大學，甚至連東外大在其官方歷史《東京外國語大學史》裏亦承認，東外大「存在造反教官」是在當時眾多大學鬥爭裏的其中一個「大特異性」（東京外国語大学史編纂委員会 294）。這將「造反教師」、「造反教官」一詞寫入大學的正史裏，使「造反」一詞呈走入了日本的文化土壤的趨勢。但應留意的是，即使產生了「造反教師」、「造反教官」等詞語，此處的「造反」仍具政治色彩，教師們所「造反」的，不論是大學還是政府，仍然是指向政局。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造反有理」代表著這時期政治運動的精神，但「造反」一詞本身概念空泛，既沒有說明誰造反、造誰的反，而「造反」本身可以是革命，也可以不是，其語義略嫌模糊。因此，在學生組織或親共團體動員羣眾、真正進行鬥爭時，他們有相當實際的目標與口號，「造反有理」於他們來說是一種廣義的精神象徵或一切實際行動的概括，其「造反」的內涵會隨時局推移而變化。亦即，「造反有理」四字反而很少出現在他們相對嚴肅的論述之中。



社會主義學生同盟馬克思列寧主義派（一般稱為 ML 派）於眾多學生左翼團體中被稱為「親中派」（船橋治 8），相對親近中國共產黨，對文革與毛澤東思想有高度評價。ML 派的機關紙《赤光》多呼籲、動員學生鬥爭，約每隔數期載有「口號」（スローガン）一欄顯示鬥爭方向。<sup>[2]</sup>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它提出七項口號，包括：

東大門爭，日大門爭勝利，全國大學鬥爭勝利！  
 使全國大學鬥爭成為粉碎安保、解放沖繩階級戰的武裝據點！  
 繼東大門爭後粉碎京大入學試！  
 解放沖繩！打倒美軍政！撤去基地！撤去 B52！  
 開始包含罷工武裝鬥爭在內的工場爭議，構築勞動者的據點！  
 四・二八安保、沖繩勞學政治大罷工戰鬥！  
 透過四・二八罷工實行體制組織化，結成安保、沖繩共鬥！  
 （スローガン 1969）

約一年後，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二日更多，提出了十四項口號，除保留了「解放沖繩」、「粉碎安保」外，也新添了「粉碎入〔境〕管〔理〕體制」、「阻止軍需生產、輸送」、「阻止強制收用三里塚」等口號（スローガン 1970）。同樣地，「造反（有理）」不在其中。

這些口號有兩大特徵：第一，複雜與長篇，對於應該盡量簡潔、用於呼喊的激烈「口號」來說，它們不便於記憶與呼喊；其次，對應時局用不同口號，相當實際。這裏無法列出《赤光》數年來所有口號，但自文革開始至一九七零年末終刊期間，他們並未用過空泛的「造反」或「造反有理」。親中的日本共產黨（左派）的機關誌《革命戰士》亦有相同情況。可以說，「造反（有理）」是大眾話語，它概括了一切屬於「造反」的社會運動，包括罷工、罷課、大學鬥爭等；學生組織等團體不抗拒「造反（有理）」一詞，否則他們亦不會在頭盔、校園的牆壁上寫上這詞，但對他們來，「造反（有理）」只是各種政治運動的精神象徵或方便的總稱。

從以上大眾傳媒、學者、學生組織對「造反有理」的理解與應用，可以歸納出「造反有理」進入日本人視野時初期的情況：首先，儘管「造反有理」在中文寫法與日語漢字寫法一樣，而且也是日本人熟悉四字結構，但其意思仍未完全獲得大眾理解，故報章每每在引用時皆以引號概括，有時會

再以括號附上日語解釋，或以例子表達其含意。在「造反有理」的解釋未成自明之理的時候，《讀賣新聞》曾釋之為「破壞是正確」，明顯是乘虛而入，曲解原意，作主觀評論。但大體來說，中文的「造反」相等於日語的「謀反」、「叛逆」、「反抗」；而「有理」則是「有道理」、「有理由」、「有正確（正當）理由」。報章為照顧所有讀者，翻譯與解釋都很直接，但投身政治的活動家，會思考當中的精神而另外解釋而在學生運動內，除了直譯「造反有理」外，也有相當具書卷氣的形而上詮釋，而不純粹視之為「把舊世界徹底打翻，砸它個稀巴爛」的行為。

其次，「造反有理」與中國一樣，同樣成為民眾運動的精神，特別在以年輕人為主體的大學運動。不論報章的顯淺解釋或曲解，也包括相對較重學術性的解釋；也不論是用作觀照中國的文革，抑還是用作概括大學運動的精神，「造反有理」依然與政治運動緊緊相扣，作為一種對政治運動的理解。這相當合理，因為「造反有理」本來就來源於中國激烈的政治鬥爭運動之中，初到日本，被當成一種外來詞語並作介紹也好，被用作概括大眾運動也好，它暫時仍未完全脫離與政治相關的語境。另一方面，由於「造反」意義頗為含糊，它未能深入成為學生組織、親中政治團體的綱領。這一種概括性的理解，反突顯「造反（有理）」具有大眾性質，而不是被少數組織獨享的概念。

## 貳、作為一般「反抗」義的理解： 「造反有理」意義的活用與擴充

起初報章引用作為中國革命口號的「造反有理」時，往往以引號括著，突顯其外來性，有時仍要以額外筆墨釋義。然而，這帶著濃厚革命意義的詞語一方面被左翼分子用作政治抗爭，它亦同時開始在日本迅速散播，逐漸被活用在與文革、校園鬥爭、左翼運動沒有關係的語境上，洗脫政治色彩。使「造反（有理）」在日本出現在地化趨勢，成為一個可抽空政治語境，其語意擴充並簡化為以下犯上、反抗意思的詞彙。

早於一九六七年開始，「造反有理」在日本已經出現被活用在與政治鬥爭完全無關的情境上，為它在日本落地生根奠下基礎。例如棋士及圍棋評論家安永一從當時「造反有理」的社會狀況悟到了與圍棋的共鳴，並於圍棋雜誌《圍棋春秋》發表名為〈造反有理：關於提高圍棋水平〉的文章，指出舊

有提高棋藝的方法有問題，應該「造反」才「有理」。他舉出兩項從前圍棋老師提出提高棋藝的方法，包括盡量選擇與高手對奕及牢記定石。關於前者，他認為這方法有矛盾，因為如果它成立，則高手若要提高棋藝也會同樣選擇高手對奕，那麼想進步的初階者就無法進步了；至於後者，他舉實際定石為例，列出棋譜，指出只記著舊有定石而不基於自身經驗來下棋，就無法體驗棋局的真諦。總括來說，安永提高棋藝的一種原則是不因循守舊前人的下棋規則，要打破舊框架，反過來思考，即「造反有理」正是提高棋藝的大原則：「至少對於現在專門老師已經形式化的〔圍棋〕教法要時常反過來實踐，即是造反的那邊是有理的」（安永一 32-36）。安永能夠借題發揮，當然是從社會濃厚的「造反」氛圍得來，但他使用的「造反有理」意思脫離了政治語境，保留了反對舊有思想的泛化意義。

「造反有理」離奇地啟了棋士安永一的圍棋觀，事實上，將「造反有理」套在與鬥爭毫無關係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詩人兼詩評人桑原央治於詩歌雜誌《日本未來派》中發表文章〈造反有理・野川由美子〉，評女演員野川由美子在電影《鬧市藍調》的演出。電影中的野川陷入丈夫與另一男子的愛情之中，她最終被丈夫以刀刺中，然後有一段科白，並站在銀幕上。她軟弱被動的模樣令桑原想起一種「玉碎」，而他認為「被玉碎的人，有呼叫造反有理的權利及義務」（桑原央治 36）。他的意思是，野川在電影中的角色被逼面對死亡，然而她應該反抗，只要反抗，就有免於死亡的可能。

泛化的用法也出現在主流報章，除語境外，「造反」的詞性亦有擴張，從動詞成為形容詞。《讀賣新聞》於一九六九年中報導一則關於汽車業的醜聞，事件關於有製車企業所製造的汽車具有缺陷，但製車工廠卻被企業要求不可接受用家的投訴，因而到運輸省請求「指導」企業回收問題汽車。報章報道：

「也請讓我們發言」——關於缺陷車輛問題，使至今一直是製  
造企業「傀儡」的工廠，發展成一場「造反」。（《走れ完全車》）

但此處所謂「造反」不過是工廠一方對企業的不滿並尋求政府協助，代表的是表達抗議、不滿、頂撞上級。有趣的是，當中的「造反」也包括訴諸政府、法律等權威，與原本打倒一切權威的「造反」可謂相反。另外，這種「造反」

相當文雅，其激烈程度與政治抗爭有差距，與紅衛兵「把舊世界打翻」的「造反」愈走愈遠。報道又說，工廠一方亦「一副『造反有理』的表情」說，企業因扣減工廠一方的工資，所以工廠不得已偷工減料，以作報復（〈走れ完全車（下）〉）。於此，「造反有理」甚至成為形容詞。同樣以「造反」作形容詞用的，還有作家倉橋由美子的愛情小說《夢の浮橋》。小說以年輕人桂子、耕一的愛情為主線，大學全共鬥運動為背景，書內多次出現相關情節，數次使用「造反教官」、「造反」等詞語。故事中，法學部教授堀田稱當自己喝醉，剛進高中的兒子會「以造反的目光看著父親的醉態」，顯示兒子對父子喝醉的不屑（倉橋由美子 129）。這裏之所以能用「造反（的）」，除了因父子不是平輩而是階級關係外，還應注意到堀田是法學部教授，是學術權威象徵，合乎當時年輕人要「造反」的對象，也讓人聯想到同為法學部教授丸山真男在全共鬥運動中所受到的不禮貌對待。

「造反（有理）」能脫離狹窄的政治事件語境，成為可以被社會廣泛運用的詞語。《讀賣新聞》的專欄「角度」討論電影《放蕩的平太》劇本時，簡略總結該劇本的主要訊息：「簡而言之，隨便妥協是大忌，即是造反有理」（〈いいかげんな妥協は禁物〉）。但是，這例子在使用「造反有理」時，不得不說非常突兀，尤其是在後者探討電影劇本的例子之中，作者的結論「隨便妥協是大忌」基本上相等於後句「即是造反有理」，此刻意使用「造反有理」予人一種刻意奚落或嘲笑，也有一種對照社會上左翼運動的意味。

七十年代初以降，雖然隨著全共鬥運動結束，文革呈失速之勢，但經歷數年，「造反（有理）」已廣為日本人熟悉，其涵義亦開始成為自明之理，在報章上被應用在各種新聞或評論上。七十年代初以降，在《每日新聞》的政治專欄，有以「造反有理」、「造反派」來解釋美國總統選舉戰況的文章（〈憂楽帳 造反有理〉）。《朝日新聞》曾以〈『造反有理』の聯署〉為副題，報道三菱油化的社長更替事件。而報道裏連用「造反」一詞，並沒有加引號，指事件主角三菱油化企業的社員要求對當時的社長退任（〈「組織の三菱」にクーデター〉）。這種在商業機構中下層對抗上層的事件並非單一事例。在《每日新聞》評論經濟的三連星在其專欄「經濟觀測」亦留意到這現象，他從「造反有理」的精神著手，評論日本財經界於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造反」現象，他說道：「〔日本〕有流行過造反有理這詞語。就是『大安旨意地坐在

權威或既成事實上並不好。應該大加批判』這樣的精神」（三連星）。「造反（有理）」的應用語境多元，就連當時日本人自己亦意識到「造反有理」作為一種風氣曾流行一時。

以上不論出自報章、雜誌、小說的例子顯示日本人在使用「造反（有理）」時相當靈活，一時視之為主題，亦會刻意借用流行用語融入報道；其詞性被擴充為形容詞「造反的」，既表達「反抗」義，或表達一種反抗的情緒。「造反（有理）」用法多元，被用於不同情境上，顯示「造反（有理）」一詞已經漸漸普及。然而，正如上述例子所示，不少地方使用「造反（有理）」時，皆刻意用引號概括之，有時也會牽強使用，使文意突兀，有時仍會刻意解釋它的意思。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社會仍意識到「造反（有理）」屬於外來詞；另一方面，它慢慢廣泛滲透到日語之中，但仍未真正成為常用日語的範疇。

### 參、作為時代記憶的理解：

#### 文化大革命退潮後「造反有理」成為日本四字熟語

直到十年文革結束，日本的各種左翼、新左翼運動亦早早落幕，「造反（有理）」的呼喊聲在中國已經成為歷史，但卻沒有在日本沉寂。它還繼續以一種泛化的「反抗」義被使用。而在青、壯年時期經歷了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社會動蕩的日本人當然都記得「造反（有理）」一詞，因此它在七十年代後期以降，又增添了新的意義：成為回顧六、七十年代的時代記憶。如上節提及，「造反有理」早在文革期間，在日本已有不少抽空其政治或意識型態背景的活用例子，使之有本地化趨勢。固然，無論在政治還非政治的語境，「造反有理」仍然帶有反對舊有體制、固有思想，並建立新想法的底色。然而，正是「造反有理」能夠被應用在非政治情況之故，即使中國文革、日本社會運動退潮，它沒有隨政治風波退卻而消失，反而仍能以那被泛化為反對舊有思想的意思，被日本人繼續使用。即使它的出現頻度並不高，但當它被運用時，卻已漸漸自然融於文章之中，褪去其本身與政治鬥爭相關的色彩，成為日本人慣用的四字熟語。

### 一、「造反有理」作為「反抗」義的延續

在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造反有理」仍間中出現在新聞上，延續承接其泛化的「反抗」義。例如雜誌《朝日 Journal》的編輯筑紫哲也於專欄「多事爭論」發表文章，將一九八三年自民黨於眾議院選舉中的大敗形容為「擁立『灰色高官』的『造反有理』」結果。「灰色高官」指在一九七六年洛克希德貪污事件中，被指有證據證實曾經收賄的二階堂進。筑紫對自民黨不滿，他認為自民黨於大敗前長時間擁立二階堂這名「灰色高官」正是一種巧妙的「造反」，而最後自民黨於選舉中大敗，印證了這「造反」確實「有理」（筑紫哲也 3）。此外，一九七六年以河野洋平為首的六名自民黨員稱脫黨組成新黨派的事，當時的國會資料協會常務理事北村光年稱之為「造反」。河野等人稱他們脫黨的理由是不滿黨內頑固思想，希望成立一個「融合資本主義長處與社會主義長處的新政黨」。但北村預料河野等人組成的新黨只是雷聲大雨點小，質疑他們的「造反」理由未必「有理」，所以其文章標題是「造反有理！？」，提出問號（北村光年 1）。應特別指出的是，「造反有理」一詞在日本被使用，用於討論或形容政治事件的反而是少數，數量遠不及其他非政治的應用。

有趣的是，當「造反有理」再出現於與中國政治相關的事件上，即「造反有理」作為原來在中國的政治語境時，報章才會加上解釋。例如《讀賣新聞》在江青被判死刑的社評上，記述她當時大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再次附加解釋兩句的日文意思為「革命に罪はない」及「むほんには道理がある」（よみうり寸評 1981）。當然，「造反有理」一詞又在不少與中國政情無關的地方出現，但當中雖然仍有特意有引號以及加以額外解釋的例子，卻有更多有不予解釋的，視讀者理解「造反有理」為自明之理。

非政治情況下對「造反有理」的泛用，於此時期仍然持續。就像多年前把「造反有理」融入圍棋的安永一，一個育兒專欄上有一篇以〈育兒正是造反有理〉為題的育兒文章，指出為父母者，應該要讓子女自由表達想法，不應強求孩子永遠跟從父母的想法，歸納出父母育兒，其實應是個「尋找造反有理的心境」（山本恭子）。作者的用意，在於苦口婆心地規勸父母不要凡事為子女作決定，而她筆下「造反有理」的意思是，讓孩子表達意見，即使意見與父母相悖（即「造反」），也應該讓他們自由表現（即「有理」）。

甚至到了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造反有理」已在日本超過三十年之久，是日本人仍偶爾使用的四字熟語，穩定地維持在泛化了的「反抗」義，也保持著六、七十年代的時代象徵意思。例如一九九九年，有經濟學家指日本銀行於一九九九年九月二日宣布維持零利率政策是對從屬美國的「造反有理」（齋藤精一郎 156-157）。從以上各例將不論在中國還是日本的，本來革命色彩濃厚的四字詞「造反有理」改造，置於各種語境之中，不僅完全脫離強烈的革命意味，也成為持久的、日常備用的四字熟語，相關例子不勝枚舉，毋須再逐一舉出。

## 二、「造反有理」作為動蕩時代的記憶點

在此左翼政治運動早已冷卻的時期，「造反（有理）」有了回顧舊時代的意義，被視為六十年代後半至七十年代初的時代象徵，以及人們回想舊時代的記憶點。有戲劇評論家回顧日本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不少劇團的大規模人事變遷、內部紛爭時，認為那是「造反有理的季節」，是「造反有理的時代情況」（石崎勝久 66-75）。政治家保坂展人初中時積極參與了學生運動，於一九八七年出版書籍《造反有理讀本》，副題名為《快樂的叛逆推薦》，並將此書作為禮物送給「迸發著青春活力，蓄勢待發」的「所有沒有耐心的少男少女」，向他們展示自己在「造反」時代如何挑戰學校等權威（保坂展人 2-3）。正因為他要寫給沒有經歷過「造反有理」時代的年輕人，他要解釋甚麼是「造反有理」，他說：「『造反有理』的時代指遙遠的一九六零年代後半至七零年左右。與其說此書是何謂『造反有理』，倒不如說是以『造反有理』以後的生活為題」（保坂展人 37）。書中，「造反（有理）」成為一種青春熱血、敢於挑戰權威的象徵。於作者而言，「造反有理」的年代及自身的「造反」，成為他懷舊的記號。

但值得一提的是，研究社會學與醫療的學者立岩真也於二零一三年出版研究精神醫療史的著作《造反有理：現代精神病學史》，研究於六十年代末日本對精神病治療方法的各種質疑、批判的論爭歷史。書名的「造反有理」，指的是當時批判精神病治療方法不人道的人，他們反對主流的精神病醫療法，被貼上「反精神醫學」的標籤，作者稱之為「造反派」，而此書則可謂為這羣「造反派」平反（才津芳昭 75-76）。在大學鬥爭勃發時，立岩大約十歲，

不能說完全親身體驗了當時的左翼運動；但對年過半百的他來說，若要以一言概括該時代的特徵，「造反有理」就是簡而精的答案。

《造反有理：現代精神病學史》與《造反有理讀本》同樣以「造反有理」為書名，但兩書除了內容與時代完全不同外，前者是嚴肅的學術書，後者是語調相對輕鬆的個人經歷。不論從嚴謹還是輕鬆的角度回憶過去，「造反有理」是親身經歷該時代的日本人的記憶點，也是不怎麼經歷過的人之切入點。

「造反有理」曾經是激烈的革命口號，後來逐漸成為日語的四字熟語，也成為往後人們所記住的六十年末至七十年代初的時代特色。整體來說，文革結束後，「造反（有理）」在日本的使用頻率並不高，但它沒有因政治鬥爭結束而被消滅，而成為日本語的一部分，被用作文章、報章、書籍的標題、副標題等，「造反有理」亦被收納在《廣辭苑》、《日本國語大辭典》等日本常用辭典裏（夏剛 24）。

### 肆、「造反有理」一度成為日本流行語的語言及思想原因

本文追究了「造反有理」於日本的接受與使用情況，可以發現它被廣泛應用及活用，後來更被視為一種時代記憶，在日本語中保留下來。因此，可以說「造反有理」是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日本的流行語。《日本大百科全書》對「流行語」的定義是「一個適應某時期人們的興趣與愛好，具有強烈共感意義、並迅速地投入使用的用語。大部分會在短時間內消滅，亦有被長期使用而融入一般語彙。隨著傳媒的發達，流行語的消長亦愈來愈快」（鈴木英夫 108）。《國語學大辭典》則定義它為「一種新語。是一種適應該時代、極具共感意義、爆炸性流行用語。大部分逐漸消滅，或成為一般語彙」（米川明彥 15）。日本語言學家米川明彥從社會、心理、語言、語言感覺四類理由，解釋流行語如何產生（米川明彥 59-89）。綜合本文所述，「造反有理」可以稱為日本流行語，而且是一種隨社會改變而產生及變化的「時代流行語」（太田彩英 168），合乎米川提出的社會、心理、語言、語言感覺四項理由。

米川認為，產生流行語的心理理由會是「追隨名人說話的大眾心理」，還有「對著名評論家使用的言語產生共鳴並積極使用」（米川明彥 69）。「造反有理」在日本的左翼運動、政治抗爭上，明顯受到毛澤東的號召與鼓動，跟著紅衛兵大喊「造反有理」。至少，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世界各地的左翼思潮勃發，日本自然亦不例外。戰後日本被美國佔領，儘管進入六十年代後經濟大翻新，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但安保條約問題激起日本左翼對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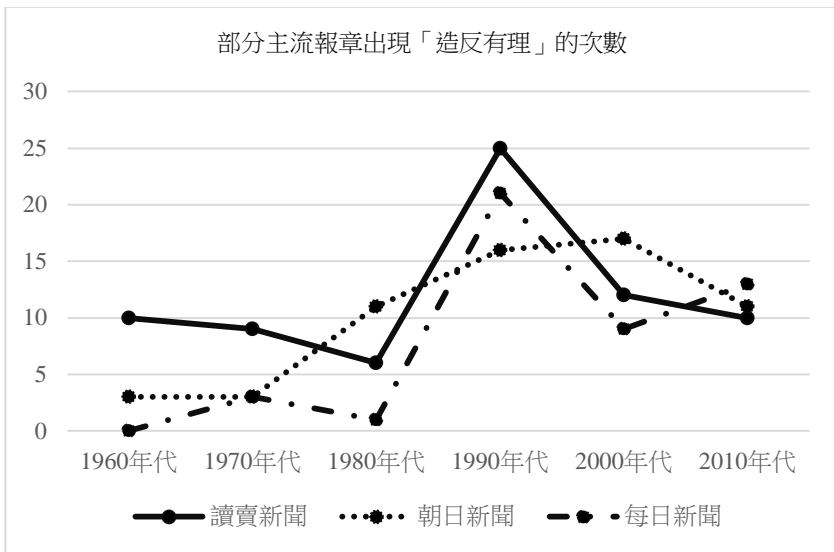
國的怨恨。表面富裕的社會下的黑暗面陸續曝光，資本主義、過度開發帶來的公害問題，使人們反思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與生活。部分人心失落的日本人目睹中國激情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被革命中國所吸引、鼓動，尋找新的出路，希望從文革與毛澤東思想中得到啟發，藉此思考日本與自身的未來（張雅晶 57）。再者，日本以後方支援美國的身分參與越南戰爭，使受反戰和平理念教育的戰後年輕人自覺到日本乃至自己成為戰爭幫兇，產生反戰情緒及罪惡感，較極端的甚至認為所謂戰後民主主義只是一場騙局（小熊英二 2009: 63, 65）。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之於日本可謂「意味著對本國政治秩序和以美國為支配者的既存國際秩序的『革命』，而不是動亂」（加加美光行 305）。「造反有理」所象徵的文化大革命，於日本左翼的反美心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對日本現代社會的各種價值的懷疑，與來自紅衛兵吶喊「造反有理」的反抗精神，不可謂沒有共鳴。

於社會上，「造反有理」合乎當時社會的世界左翼思潮，它也燃點起日本的公害問題、勞工權益問題、安保條約爭議等，此自不待言。此外，透過各種媒體，大眾，來自中國的文獻，反覆聽到及看到該流行語，也助長了流行語傳播（米川明彥 60）。報章中使用「造反有理」的次數不算相當頻密（表一），但「造反有理」的旗幟在各種示威運動、呼喊，它被不同文字媒介運用，這口號亦被掛在東京大學校門前，很容易獲得公眾注目。事實上，有當時的學生於事後承認是從新聞、電視的文革報道而對「造反有理」產生共鳴（福岡愛子 2014: 272）。因此，在資訊流通自由的日本，「造反有理」於文字上、影像上頻繁出現在日本人眼前，使之不斷在日本廣泛持續傳播。

值得一提的是，從表一的統計可見，作為流行語的「造反有理」不僅沒有隨政治風波結束而被消滅，反而繼續出現在各種主流報章中，在一九九零年代達至高峰。「造反有理」於一九九零年代的《每日新聞》更出現高達二十一次，《讀賣新聞》則有二十五次，往後次數回落，但整體的使用次數都超過經歷了社會動蕩的一九六零、一九七零年代，可見該詞已在日本紮根，並頗具「生命力」。這些數據帶出相當尋人耐味的問題，即：為何於一九九零年代後，社會運動已經止息的時代，「造反有理」在報章出現的次數，竟多於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六、七十年代？以《朝日新聞》於一九九零年代的十六則新聞報道為例，本文發現當中七篇以「造反有理」來回顧中國文革時期或以之概括當時日本與中國的時代特徵，九篇則是以之為「反抗」義。本文認為，於一九九零年代，「造反有理」作為時代記憶點（不論是對中國還

是對日本的記憶)，以及作為泛化的「反抗」義，兩種功能並行存在，反而增加了「造反有理」的「曝光率」。此時期前的「造反有理」，不具概括時代與記憶功能，此時期後的「造反有理」，雖然並保留兩種功能，但作為「反抗」義的功能，又逐漸不被使用。這使得「造反有理」在一九九零年代出現在報章的頻率反而別樹一幟。

表一：三份主流報章標題或內文提及「造反有理」的次數。《讀賣新聞》的統計來自其資料庫 Yomiuri Database Service；《朝日新聞》的統計來自其資料庫 Asahi News Database；《每日新聞》的統計來自其資料庫「每索」。



流行語傳播的社會與心理原因，都和該社會的思想甚至世界思潮有密切關係，日本人明顯有接受、認同甚至使用「造反有理」的內緣思想史理由。還必須指出的是，「造反有理」能迅速被日本人適應接受，並在往後能留在日語內，語言因素也相當重要。漢字是日語重要的組成部分，中文「造反有理」被「翻譯」到日文上，它還是「造反有理」。因此在流行語傳播的語言因素上，米川指出該語言的「語形、意味、用法的奇特、新鮮感、可於日常範圍使用的廣度等」也會導致流行語的產生（米川明彥 76）。在用法上，上文各例可以看到，「造反有理」本身是革命口號，但日本人擴充了其可使用範圍，使它能活用於各種日常情境，如化作提高圍棋技術的原則、育兒原則等，擴充了其涵義，增加了用途。

在語言上，字形與文字特性上，日本有使用四字熟語的傳統，四字熟語相於中國的四字成語。「造反有理」在日語漢字上，於字形、字義、語序並沒有齟齬。於是「造反有理」毋須被再造或省略成分，可以直接使用與傳播。亦因為漢字屬方塊字，它甚至有時出現「變奏」，被刻意改造為「造反無理」。擅於畫政治諷刺漫畫的近藤日出造曾畫了一幅諷刺文革的漫畫，畫上神情得意、舉著右手的毛澤東騎著一隻垂頭喪氣的騾，騾的前左腳與後左腳被腳鐐綁著，畫的左下方寫著「文革收拾造反無理」（近藤日出造 31）。亦有論者認為大學鬥爭裏「造反有理」的風氣有蔓延至高中、初中之虞，於是撰文〈造反有理還是無理：關於學園鬥爭〉承認學校教育有缺陷，但提出自己的「造反無理說」，強調不能容許學生破壞社會秩序、忽略道德、無視他人權利（吉田清 122-130）。上述兩例利用漢字結構，將「造反有理」改造為「造反無理」，意思相反，但仍是四字詞。

在語言感覺上，米川指該語彙「表現的感覺化，指感覺地發出沒有意思的聲音」，通常指擬音、擬態詞，有「語言遊戲的感覺」（米川 87-88）。「造反有理」雖然仍然有其含義，但因其發音「有理」（yūri）與「愉快」（yukai）近似，使有當時大學生運動的參加者以「造反愉快」來回顧這段歷史，同時視之為青春熱血的記憶（三橋俊明 145-149）。如同利用字形與字數產生「造反無理」一樣，「造反愉快」則是從語音產生。這兩種巧妙的更動，當然歸功於日本與中國同樣使用漢字的便利。

從以上各種原因看來，「造反有理」在日本成為流行語顯得沒有違和感。於社會心理、思想層面上，日本人有對「造反有理」產生共鳴的理由；於言語文字上，「造反有理」既是漢語，亦是日語，它合乎日語四字熟語的傳統，毋須翻譯、改造，照用可矣。此處亦無意深究哪種原因於造成「造反有理」的傳播中為最重要，而這問題的意義其實亦不大，因為明顯地，各種原因互相加強。

### 結語、「造反有理」：政治運動的非政治遺產

本文從自六十年代以降各種使用「造反有理」的文獻，分析「造反（有理）」的使用情況，探討它於日本的使用情況，觀察它融入日語的過程。「造反有理」作為的革命號召，很順理成章地於中國各地被羣眾使用。毛思想在六十年代的日本大有市場，學者著書立說、各種公開討論、各類中國文

獻翻譯出版，都帶起了日本的毛澤東思想熱（馬場公彦 231）。而毛澤東思想當然也可以憑簡單一句口號——「造反有理」影響日本。除了歸因於世界左翼政治潮流的外因外，日本人自身亦有內緣的思想史原因，接受或對毛澤東思想產生興趣，對懷疑現代價值、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質疑現代價值的年輕人來說，他們對象徵激烈反抗、推翻舊制度的「造反有理」產生共鳴。另一方面，在語言上，日本本身有四字熟語傳統，「造反有理」四字亦非艱深漢字，<sup>[3]</sup>其寫法亦與日語漢字寫法無異，於是在各種媒體上、左翼運動等被使用，成為日本的流行語，順利廣泛傳播。日本雖然亦有「下剋上」的歷史傳統，但一開始對「造反有理」的意義仍然陌生，所以在傳入初期時，大眾傳媒或左翼運動分子都尋求「造反有理」的意思，加以解釋，顯示其外來性。

一開始，「造反（有理）」作為一種對政治運動的理解。它既反映中國的文革精神，亦反映日本各種鬥爭中與文革呼應的地方。在全共鬥，以及各種毛澤東語錄被製成橫額掛在當眼處、寫在頭盔上、印在高舉的旗幟上、成為校園裏的塗鴉，亦衍生出「造反教師」、「造反教官」詞語。

及後，「造反（有理）」從革命用語演變到一般用語，被應用在社會不同層面，甚至改變了詞性。其革命色彩逐漸淡化，泛指下層對上層的反抗或抗議。當然，從廣義來說，「造反」在日本仍然留有革命的底色，只要將「革命」理解為質疑乃至推翻舊有思想、系統或體制，只是它的應用層面不局限於政治情況，而廣及教育、醫學、棋藝、影評，也成為文學小說的詞語。於此，「造反（有理）」正式融入日本語境，成為可廣泛使用的詞語。

隨著文革結束，本來富於政治意義的「造反（有理）」口號與旗幟在中國與日本不再被羣眾熱情地舉起，但分別作為四字熟語及一般詞語的「造反（有理）」則保留下來，名正言順地留在日語之中。正因為「造反（有理）」的意義很早就出現泛化，被各種去政治化的應用下，它能免於跟隨政治風波消失而被消滅。因此，在「大部分會在短時間內消滅，亦有被長期使用而融入一般語彙」的流行語現象中，它屬於倖存的後者。當然，它還是帶著強烈的時代色彩，於文革記憶逐漸消失的同時，它亦變成一個較冷僻的詞。但這不代表它已經在日本消失，事實上，「造反有理」目前又以日本漢字檢定第五級（約等於日本的小學六年級畢業程度）四字熟語測考範圍的角色，存在於日本人的視野內（「造反有理」）。

正如興膳宏所說：「雖然以『十年浩劫』作總結的文革幾乎全被否定，而現在關於它的記憶亦逐漸被忘卻，但只有『造反』這詞語作為一般用語存留下來」（興膳宏 36）。當然，這詞語或四字熟語的實用性並不高，一些

精選的四字熟語辭典也沒有收錄「造反有理」(俞鳴蒙 118, 126)。但興膳的說法,反映了褪去政治色彩的,並擴充了使用範圍的「造反(有理)」正是政治運動下的一種非政治遺產:成為日本語的一部分。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建言,使文章論述與結構更為清晰,特此致謝。

## 註釋

1. 上海《文匯報》則發表文章〈革命造反有理萬歲〉,指出「『造反有理』。這個口號永遠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口號。是真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假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對待這個口號,以甚麼態度對待革命造反派,這是檢驗他們的試金石。……每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都要高舉起革命造反的大旗,以當一個革命造反派而自豪」(〈革命造反有理萬歲〉)。
2. 《赤光》於一九六九年有五期,一九七〇年有八期列出口號。
3. 查文部科學省最新的《小學校學習指導要領》的〈別表 学年別漢字配当表〉,「造」、「反」、「有」、「理」分別是小學五、三、三、二年級學習的漢字(文部科學省 2008)。

## 徵引文獻

- 馬場公彦(2010)《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まで》(東京：新曜社)。
- 曹嗣衡(2022)〈當資本主義遇上毛澤東主義：以《毛澤東語錄入門》為中心考察一九七〇年代日本商界對毛澤東思想的接受與演繹〉。《亞洲文化》no. 46 (Dec.): 77-91。
- 東京外国語大学史編纂委員会(編)(1999)《東京外国語大学史》(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
- 福岡愛子(2014)《日本人の文革認識：歴史的轉換をめぐる「翻身」》(東京：新曜社)。
- 福岡愛子(2021)〈日本人の文革認識〉。程映虹(著);劉燕子(編譯):《マオイズム(毛沢東主義)革命：二〇世紀の中国と世界》(福岡：集広社), 477-491。
- 船橋治(2022)〈《赤光》第1号(創刊号)の謎〉。不二出版(編):《《赤光》総目次・索引・附《赤光》第1号》(東京：不二出版), 5-11。
- 〈学生は発言する：11月決戦の戦術と戦略〉(1969)《週刊読売》, 13 Nov.: 12-59。

- 〈革命造反有理萬歲〉(1967)《文匯報》(上海), 6 Jan.。
- 〈走れ完全車(下)〉(1969)《読売新聞》(朝刊), 20 Jun.: 14。
- 保坂展人(1987)《造反有理読本: 楽シイ反逆ノススメ》(名古屋: 風媒社)。
- 〈いいかげんな妥協は禁物〉(1969)。あんぐる。《読売新聞》(夕刊), 18 Oct.: 9。
- 石崎勝久(1976)〈私家版・戦後劇団分裂史-7-造反有理の季節〉。《新劇》no. 23.12 (Dec.) [284]: 66-75。
- 夏剛(2019)〈辞典に見る日・中の国柄(3)〉。《立命館産業社会論集》55.1: 17-27。
- 加加美光行(2019)〈文化大革命與現代日本〉。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 史實與研究》(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 305-318。
- 菊地昌典(1967)〈造反有理: 反権力へ強い指向 奪権の瞬間から再び胎内に〉。現地にさぐる文化大革命の底流。《朝日新聞》(朝刊), 13 May: 3。
- 北村光年(1976)〈造反有理! ?〉。《国会月報》23.6 (Jun.) [330]: 1。
- 近藤日出造(1968)〈文革収拾造反無理〉。《漫画: 見る時局雑誌》no. 7: 31。
- 〈コンピューターがなんだ〉(1969)。《朝日新聞》(朝刊), 22 Sept.: 14。
- 興膳宏(2005)〈造反、「文革」の象徴、日本でも流行〉。漢字コトバ散策。《日本経済新聞》, 15 May: 36。
- 倉橋由美子(1971)《夢の浮橋》(東京: 中央公論社)。
- 黒田基樹(2021)《下剋上》(東京: 講談社)。
- 桑原央治(1970)〈造反有理・野川由美子〉。《日本未来派》no. 135: 28-37。
- 劉禾[Liu Lydia H.] (1995)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gos” (2010) *The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 Lovell, Julia (2019) *Maoism: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Knopf).
- 毛澤東(1939)〈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馬克思主義文庫》, 21 Dec. , 馬克思主義者互聯網檔案館委員會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1-122.htm>)。
- 〈毛主席の理論秘書: 造反有理陳伯達〉(1967)天安門上の人々。《朝日新聞》(夕刊), 6 Apr.: 2。
- 三橋俊明(2018)《全共闘、1968年の愉快的な叛乱》(東京: 彩流社)。
- 文部科學省(2008)〈別表: 学年別漢字配当表〉。《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東京: 文部科學省), 18-20。MEXT ([https://www.mext.go.jp/a\\_menu/shotou/new-cs/youryou/syo/koku/\\_icsFiles/afiedfile/2016/10/27/1234920.pdf](https://www.mext.go.jp/a_menu/shotou/new-cs/youryou/syo/koku/_icsFiles/afiedfile/2016/10/27/1234920.pdf))。

- 〈毛沢東路線と劉少奇〉(1967)社論。《読売新聞》(朝刊), 24 Apr.: 2。  
 新島淳良、河野福次、高野威、岸本五郎(討論人)(2015)シンポジウム 毛沢東思想と日本の学生運動(抄)。左竹茂(提問)。前田年昭(解題)。《中国60年代と世界》no. 5: 58-64。
- 牛雨薇(2021)〈日中両言語における四字熟語の使用頻度に関する一考察：欧米文学作品の日中訳本を手掛かりに〉。《日本アジア研究》no. 18: 1-22。
- 小熊英二(2009)《1968(上): 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東京: 新曜社)。  
 小熊英二(2009a)《1968(下): 叛乱の終焉とその遺産》(東京: 新曜社)。
- 太田彩英(2020)〈新語・流行語の定着の法則性について〉。《山口国文》no. 43 (Mar.): 148-168。
- 斎藤精一郎(1999)〈民権宣言: 日銀のNO! 米国従属への造反有理〉。《週刊ダイヤモンド》, 9 Oct.: 156-157。
- 才津芳昭(2015) 書評。立岩真也(著), 《造反有理: 精神医療現代史へ》。《保健医療社会学論集》25.2: 75-76。
- 三連星(1971)〈造反有理は強者のみ通用〉。《経済観測》(毎日新聞)(東京夕刊), 5 Apr.: 7。  
 〈「組織の三菱」にクーデター: 社長留守で決起 役員結束「造反有理」の連判状〉(1972)《朝日新聞》(朝刊), 30 Jun.: 8。
- スローガン(1969)《赤光》, 25 Feb.: 1。  
 スローガン(1970)《赤光》, 22 Mar.: 3。
- 鈴木英夫(1994)「流行語」。渡邊静夫(編): 《日本大百科全書》, 第二十四卷(東京: 小学館), 108。
- 立花隆(1969)〈東大ゲバルト壁語録〉。《文藝春秋》47.3 (Mar.): 126-132。  
 高木健夫(1967)〈父のシゴキと風土 「抵抗」の毛思想を生む〉。これが中国だ。《読売新聞》(朝刊), 5 Jan.: 1。
- 譚汝謙(2014)〈京大、普大: 我的博士之路〉。《灼見名家》, 15 Nov. (www.masterinsight.com)。
- 時のことば(1969)《読売新聞》(朝刊), 2 Jun.: 5。
- 筑紫哲也(1984)〈「灰色高官」擁立の「造反有理」〉。《朝日ジャーナル》no. 46: 3。
- 渡辺眸(2008)《フォトドキュメント: 東大全共闘 1968-1969》(東京: 角川)。  
 山本恭子(1982)〈子育てはまさに造反有理〉。《朝日新聞》(朝刊), 28 Sept.: 15。  
 安永一(1967)〈造反有理: 基の上達法について〉。《囲碁春秋》no. 12: 32-36。  
 よみうり寸評(1967) 社評。《読売新聞》(夕刊), 13 Jan.: 1。

- よみうり寸評(1981) 社評。《読売新聞》(夕刊), 27 Jan.: 1。
- 米川明彦(1989)《新語と流行語》(東京:南雲堂)。
- 吉田清(1969)〈造反有理か無理か〉。《新体育》39.6: 122-130。
- 俞鳴蒙(2018)〈日中四字熟語・成語に関する調査研究〉。《撰大人文学》no. 25: 117-136。
- 〈憂楽帳: 造反有理〉(1974)《毎日新聞》(東京夕刊), 10 Aug.: 7。
- 「造反有理」(2018)モジナビ。Mojinavi.com  
(<https://mojinavi.com/d/u902053cd67097406>)。
- 〈造反有理〉(1966)《人民日報》, 26 Aug.: 2。
- 張雅晶(2001)〈日本人の中國觀: 以「文化大革命」時期為中心〉。《輔仁歷史學報》no. 12: 41-84。
- 「ぞう-はん」(2022)《広辞苑》。第七版(東京:岩波書店)。
- 「ぞうはん-ゆうり」(2022)《広辞苑》。第七版(東京:岩波書店)。

## WORKS CITED

- Baba Kimihiko (2010) *Sengonihonjin no Chūgokuzō: Nihon Haisen kara Bunkadaikakumei • Nicchūfukkō made* [Chinese Image in the Postwar Japan: From Defeat to Normalizing Relations] (Tokyo: Shinyōsha).
- Cho Chi Hang (2022) “When Capitalism Meets Maoism: Japanese Business Community’s Acceptan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during the 1970s as Seen in *An Introduction to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 *Asian Culture*, no. 46 (Dec.): 77-91.
- Committee of History of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ed.) (1999) *Tōkyō Gaikokugo Daigakushi* [History of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Tokyo: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Fukuoka Aiko (2014)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Mainland China: How It Was Perceived in Japan* (Tokyo: Shinyōsha).
- Fukuoka Aiko (2021) “Nihonjin no Bunkaku Ninshiki” [The Japanese Percep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ing-Hong Cheng; Yan-zi Liu (ed. and trans.): *Maoist Revolutio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20th Century* (Fukuoka: Shūkōsha), 477-491.
- Funabashi Osamu (2022) “Shakkō Daiichigō (sōkangō) no Nazo” [The Mystery of the First Issue of *Shakkō*]. Fujishuppan (ed.): *Shakkō Sōmokuji, Sakuin, fu Shakkō Daiichigō* [Content, Appendix and First Issue of *Shakkō*] (Tokyo: Fujishuppan), 5-11.



- “Gakusei wa Hatsugensuru: 11 gatsu Kessen no Senjutsu to Senryaku” [Students Speak Out: Tactic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November Decisive Battle] (1969) *Shūkan Yomiuri* [*Yomiuri Weekly*], 13 Nov.: 12-59.
- “Geming Zaofan Youli Wansui” [Long Live the Revoution] (1967) *Wen Wei Po* (*Shanghai*), 6 Jan..
- “Hashire Kanzenguruma (Ka)” [Running Car (Part 3)] (1969) *Yomiuri Shimbun* (*Morning*), 20 Jun.: 14.
- Hosaka Nobuto (1987) *Zōhanyūri Tokuhon: Rakushī Hangyaku no Susume* [*Rebellion Textbook: Joyful Rebellion Recommendation*] (Nagoya: Fūbaisha).
- “Iikagen na Dakyō wa Kinmotsu” [No Halfhearted Compromise] (1969) Anguru [Angle]. *Yomiuri Shimbun* (*Night*), 18 Oct.: 19.
- Ishizaki Katsuhisa (1976) “Shikaban • Sengo Gekidan Bunretsushi-7-Zōhanyūri no kisetsu” [A Private Version: A Postwar History of the Troupe’s Split-7-The Season of To Rebel Is Justified]. *Shingeki* [*New Drama*] 23.12 (Dec.) [284]: 66-75.
- Ka Go (2019) “Jiten ni Miru Nicchū no Kunigara (3)”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Japan and China in Dictionaries (3)]. *Ritsumeikan Review of Industrial Society* 55.1: 17-27.
- Kagami Mitsuyuki (2019) “Wenhudageming yu Xiandai Rib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Modern Japan]. Qing-Feng Liu (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s and Analysi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305-318.
- Kikuchi Masanori (1967) “Zōhanyūri: Hankenryoku e Tsuyoi Shikō, Dakken no Shunkan kara Futatabi Tainai ni” [To Rebel Is Justified: Strong orientation towards anti-authority, from the moment of deprivation to the womb again]. Genchi ni Saguru Bunkadaikakumei no Teiryū [Discovering the Basic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sahi Shimbun* (*Morning*), 13 May: 3.
- Kitamura Mitsutoshi (1976) “Zōhanyūri!?” [To Rebel Is Justified!?] *Kokkai Gepō* [*The Diet Monthly*] 23.6 (Jun.) [330]: 1.
- Kondō Hidezō (1968) “Bunnkakushūshū Zōhanmuri”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Rebel Is Not Justified]. *Manga: Miru Jikyoku Zasshi* [*Know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from Manga*] no. 7: 31.
- “Konpyūtaa ga nanda” [What Is Computer] (1969). *Asahi Shimbun* (*Morning*), 22 Sept.: 14.
- Kōzen Hiroshi (2005) “Zōhan, ‘Bunkaku’ no Shōchō, Nihon demo Ryūkō” [Rebellion, Symbo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lso Prevalent in Japan]. Kanji Kotoba Sansaku [Talking about Chinese Characters]. *Nihon Keizai Shimbun*, 15 May: 36.
- Kurahashi Yumiko (1971) *Yume no Ukihashi* [*The Dream of the Floating Bridge*] (Tokyo: Chūōkōronsha).
- Kuroda Motoki (2021) *Gekokujō* [*The Lower Rules the Higher*] (Tokyo: Kōdansha).

- Kuwabara Ōji (1970) “Zōhanyūri, Nogawa Yumiko” [To Rebel Is Justified and Nogawa Yumiko]. *Nihon Miraiha* [*The Japanese Futurism*] no. 135: 28-37.
- Liu Lydia H. (1995)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gos” (2010) *The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 Lovell, Julia (2019) *Maoism: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Knopf).
- Mao Zedong (1939) “Zai Yan’an Gejie Qingzhu Sidalin Liushi Shouchen Dahuishang de Jianghua” [Speech at the Celebration of Stalin’s Sixtieth Birthday in Yan’an].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1 Dec.,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Committe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1-122.htm>).
- Mihashi Toshiaki (2018) *Zenkyōtō, 1968 nen no Yukai na Hanran* [All-Campus Joint Struggle Committees, Joyful Rebellion in 1968] (Tokyo: Sairyūsha).
-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 “Beppyō: Gakunenbetsu Kanji Haitōhyō” [Annexed table: Chinese Characters for Different Academic Year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ing Guide for the Japanese Course of Study*. Tokyo: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8-20. *MEXT* ([https://www.mext.go.jp/a\\_menu/shotou/new-cs/youryou/syo/koku/\\_icsFiles/afieldfile/2016/10/27/1234920.pdf](https://www.mext.go.jp/a_menu/shotou/new-cs/youryou/syo/koku/_icsFiles/afieldfile/2016/10/27/1234920.pdf)).
- “Mōshuseki no Riron Hisho: Zōhanyūri Chin Hakutatsu” [Chairman Mao’s Theoretical Secretary: Chen Boda’s Rebellion Is Justified](1967) Tenanmonjō no hitobito [The People at Tiananmen]. *Asahi Shimbun (Night)*, 6 Apr.: 2.
- “Mōtakutō Rosen to Ryūshōki” [Mao Zedong and Liu Shaoqi] (1967) Editorial. *Yomiuri Shimbun (Morning)*, 24 Apr.: 2.
- Niijima Atsuyoshi, Kono Fukuji, Takano Takeshi, Kishimoto Gorō (discuss.) (2015) *Shinpojiumu Mōtakutōshisō to Nihon no Gakuseiundō (Shō)* [The Symposium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Student Activism in Japan]. questioner Takeshige Hidari; introd. Maeda Toshiaki. *Chūgoku 60 Nendai to Sekai* [1960s of China and the World] no. 5: 58-64.
- Niu Yuwei (2021) “Nicchū Ryōgengo ni okeru Yojijukugo no Shiyōhindo ni kansuru Ichi kōsatsu: Ōbei Bungakusakuhin no Nicchū Yakuhon wo Tegakari ni” [Investigation into the Frequency of Using Four-Character Idioms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Using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Literary Fictions]. *Journal of Japanese & Asian Studies*, no. 18: 1-22.
- Oguma Eiji (2009) *1968(Jō): Wakamonotachi no Hanran to sono Haikei* [1968: Youth Rebellion and Its Background] (Tokyo: Shinyōsha).
- Oguma Eiji (2009a) *1968(Ka): Hanran no Shūen to sono Isan* [1968: The End of the Rebellion and Its Legacy] (Tokyo: Shinyōsha).

- Ōta Sae (2020) “Shingo • Ryūkōgo no Teichaku no Hōsokusei nitsuite” [Regularity of Establishing New Words and Buzzwords]. *Yamguchikokubun [Yamaguchi Journal of Japanese Language]*, no. 43 (Mar.): 148-168.
- Saitō Seiichirō (1999) “Minkensengen: Nichigin no NO! Beikoku Jūzoku eno Zōhanyūri” [Declaration of Civil Rights: Say NO to American Subordination, a Rebellion by the Bank of Japan]. *Shūkan Daiyamondo [Diamond Weekly]*, 9 Oct.: 156-157.
- Saitsu Yoshiaki (2015) Rev. of *Zōhanyūri: Seishiniryō Gendaishi e [To Rebel Is Justified: A Modern History of Psychiatric Treatment]*, by Tateiwa Shin'ya.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Health and Medical Sociology* 25.2: 75-76.
- Sanrensei (1971) “Zōhanyūri wa Kyōja Nomi Tsūyō” [The Rationale of “To Rebel Is Justified” Only Applies to the Strong]. *Keizai Kansoku [Economic Observation]*. *Mainichi Shimbun (Tokyo Night Post)*, 5 Apr.: 7.
- “‘Soshiki no Mitsubishi’ ni Kūdetaa: Shachōrushu de Kekki. Yakuin Kessoku ‘Zōhanyūri’ no Renhanjō” [Coup d’état in Mitsubishi: Staff Rebel While the President Is Away] (1972) *Asahi Shimbun (Morning)*, 30 Jun.: 8.
- Surōgan [Slogan] (1969) *Shakkō [The Red Light]*, 25 Feb.: 1.
- Surōgan [Slogan] (1970) *Shakkō [The Red Light]*, 22 Mar.: 3.
- Suzuki Hideo (1994) “Ryūkōgo.” Shizuo Watanabe (ed.): *Encyclopedia Nipponica*, vol. 24 (Tokyo: Shōgakusan), 108.
- Tachibana Takashi (1969) “Tōdai Gebaruto Hekigoroku” [Wall Quotations of the Struggle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Bunkei Shunshū* 47.3 (Mar.): 126-132.
- Takagi Takeo (1967) “Chichi no Shigoki to fūdo. ‘Teikō’ no Mōshisō wo Umu” [Father’s Harsh Training and Climate Give Rise to the Maoist Thought of ‘Resistance’]. *Kore ga Chūgoku da [This is China]*. *Yomiuri Shimbun (Morning)*, 5 Jan.: 1.
- Tam Yue-Him (2014) “Jingda, Puda: Wo de Boshi zhi Lu” [Kyoto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My Journey to a Doctorate]. *Master-Insight*, 15 Nov.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4%BA%AC%E5%A4%A7%E3%80%81%E6%99%AE%E5%A4%A7-%E6%88%91%E7%9A%84%E5%8D%9A%E5%A3%AB%E4%B9%8B%E8%B7%AF/>).
- Toki no Kotoba [Word of the Day] (1969) *Yomiuri Shimbun (Morning)*, 2 Jun.: 5.
- Tsukushi Tetsuya (1984) “‘Haiiro Kōkan’ Yōritsu no ‘Zōhanyūri’” [Embracing Unpopular Officials Is a Form of “Rebellion”]. *Asahi Journal*, no. 46: 3.
- Watanabe Hitomi (2008) *Fotodokumento: Tōdaizenkyōtō 1968-1969 [Photodocument: All-Campus Joint Struggle Committees in Tokyo University 1968-1969]* (Tokyo: Kadokawa).
- Yamamoto Kyōko (1982) “Kosodate wa Masani Zōhanyūri” [Rebellion Is the Key to Child Rearing]. *Asahi Shimbun (Morning)*, 28 Sept.: 15.

- Yasunaga Hajime (1967) “Zōhanyūri: Go no Jōtatsuhō nitsuite” [To Rebel Is Justified: A Way to Build Up Go Technique]. *Igo Shunshū*, no. 12: 32-36.
- Yomiuri Sunpyō [Yomiuri Review] (1967) Editorial. *Yomiuri Shimbun (Night)*, 13 Jan.: 1.
- Yomiuri Sunpyō [Yomiuri Review] (1981) Editorial. *Yomiuri Shimbun (Night)*, 27 Jan.: 1.
- Yonekawa Akihiko (1989) *Shingo to Ryūkōgo* [New Words and Buzzwords] (Tokyo: Nanundō).
- Yoshida Kiyoshi (1969) “Zōhanyūri ka Muri ka” [Is Rebellion Justified or Unjustified]. *Shin Taiiku* [New Physical Education] 39.6: 122-130.
- Yu Ming-Meng (2018) “Nicchū Yojijukugo, Seigo ni kansuru Chōsakenkyū” [A Research of Four-Letter Idioms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Setsudai Review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25: 117-136.
- “Yūrakuchō Zōhanyūri” [The Note of Worry and Joy: To Rebel Is Justified] (1974) *Mainichi Shimbun (Tokyo Night Post)*, 10 Aug.: 7.
- “Zao-fan ou-li” [To Rebel Is Justified] (2018) *Mojinabi*. Mojinavi.com (<https://mojinavi.com/d/u902053cd67097406>).
- “Zaofan youli” [To Rebel Is Justified] (1966) *The People's Daily*, 26 Aug.: 2.
- Zhang Ya-Jing (2001) “Japanese Perspective on China: Focus on the Perio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Fu Jen Historical Journal*, no. 12: 41-84.
- “Zōhan” (2022) *Kōjien*. 7th edition (Tokyo: Iwanami Shoten).
- “Zōhanyūri” (2022) *Kōjien*. 7th edition (Tokyo: Iwanami Shoten).

From Revolution to Everyday Life  
An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logan  
“To Rebel Is Justified” (Zaofan-youli)  
Becoming a Four-Letter Idiom in Japan

CHO Chi-H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o rebel is justified” was the revolutionary slogan of the Red Guard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later became a four-letter idiom in Japa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ocalization of Mao Zedong’s revolutionary slogan “to rebel is justified” (Zaofan-youli) and “Rebellion” (Zaofan) in Japan, based on mainstream Japanese newspapers, column articles, magazine articles, publications of student organizations and left-wing groups as well as popular fiction from the late 1960s onwards, and explains how “to rebel is justified” was first received by the Japa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n gradually became a four-letter idiom often used in less politically relevant contexts. It became a four-character phrase often used in less political contexts and localized in Japan.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original revolutionary slogans into the Japanese language system is a phenomenon that reflects a facet of the Japanese acceptance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shows how a political thought can leave its non-political legacy in Japan.

KEYWORDS: To rebel is justified, Cultural Revolution, Japan, four-letter idiom, buzzword